

义理与时势：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探析^{*}

陶 莎

内容提要 澶渊之盟缔结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转为强势,目的在于落实辽朝对高丽的宗主国身份,端正高丽作为臣属的态度及义务。探究其背后原因,于内是要树立君主权威、实现政治理想,于外则希望借重构辽丽关系取得主导东北亚秩序的地位。为此辽圣宗对高丽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战争与交涉,虽然因双方国力损耗过大而结束对抗状态并搁置争议,圣宗的高丽政策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但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间的宗藩关系也正是在此时逐渐走向成熟。

关键词 辽圣宗 高丽 外交政策 宗藩关系

11世纪伊始,伴随着辽宋“澶渊之盟”的缔结,双方战争、对立的状态也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辽宋互称“南朝”“北朝”,约以“兄弟之盟”。澶渊之盟的确立,令辽朝不得不终止南征计划,重新寻找主导东亚秩序的突破口,表面臣服,实则不驯的高丽成为了新的战略目标。

在中韩关系史领域,一般认为双方的宗藩关系确立于辽圣宗时期,并一直为后世王朝所延续。^①深入探讨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的转变,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以及东亚秩序的理性认识,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描绘辽朝对“中国”身份的定位及追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就辽丽双方宗藩关系形成未稳的一段时间内,对辽朝落实宗主权利的努力以及背后动因进行探讨,力争加深对古代中朝关系、东亚秩序的认识。

澶渊之盟后辽朝对高丽政策的变化

10世纪晚期,在宋朝的协调下,自西向东,包括西域、漠北、宋朝、高丽等政权在内,一个环绕辽朝边疆的多政权反辽同盟渐趋形成。^②年幼的耶律隆绪在这种情况下即位,是为辽圣宗。政治经验丰富的承天太后奉遗诏执掌国事,在耶律斜轸、韩德让等人的尽力辅佐下,辽朝对反辽同盟各个击破,在外交困境中突出重围。在此过程中,为切断高丽同宋朝的联系,以确保南征不被掣肘,辽朝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成功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此后,辽便鲜少东顾,专意南征,直到澶渊之盟缔结后才又着手调整对高丽政策。

1. 讨逆宣威、欲正宗藩

统和二十八年(1010)五月,承天太后丧葬完毕四十三天后,辽圣宗下诏“高丽西京留守康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族士人与辽代社会研究”(项目号:17BZS133)、广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辽帝国对高丽政策与东亚秩序研究”(项目号:GD18YLS01)的阶段性成果。

弑其主诵,擅立诵从兄询。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③随后遣使高丽“问前王(穆宗)之故”^④,并以“自将伐高丽,遣使报宋”^⑤,又遣枢密直学士高正、引进使韩杞至高丽“告兴师”^⑥。一系列动作在几个月内完成,并对高丽“乞罢师”^⑦不予理会,可见辽圣宗整理辽丽关系决心之坚定。

十一月,辽朝大军渡过鸭绿江,双方展开了历时近六十日的交锋。具体战争细节《辽史》《高丽史》均有描述,前辈学人亦做过细致梳理,此不赘述。翻阅《高丽史》,发现在辽军推进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双方关于“退兵”的交涉,以下笔者对交涉做一分析,以厘清辽朝出兵的目的及其对高丽的政策。

(1) 第一次交涉

辽朝大军渡过鸭绿江后,辽圣宗下谕降书与敕书明告兴化镇守军“逆臣康兆弑君立幼……汝等擒康兆送驾前,使即回兵,不然,直入开京,杀女妻孥。”“朕将精锐来讨罪人,其余胁从,皆与原免。况汝等受前王抚绥之惠,知历代顺逆之由,当体朕怀,无貽后悔。”兴化镇守军不为所动,上书请求撤兵。辽圣宗复又下敕书,重申出兵讨逆之目的,并导之以为臣之道,依旧无果。于是圣宗下旨“汝等慰安百姓而待之。”遂解兴化镇之围,移军铜山之下。^⑧辽丽双方关于退兵的交涉告一段落,交战正式拉开。

从双方的互动交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辽圣宗几番下诏均申明发兵旨在讨逆,希望高丽履行臣子义务,同时说明不予配合的后果;其次,诏书中屡次强调辽丽间的宗藩关系,指出辽朝作为宗主国发兵讨逆的合法性,又点明显宗王询为逆臣所立,且此时未获辽册封,王位继承程序并未完成;再次,兴化镇守军上表之言多有不恭,然辽圣宗只是围而不打,尽力晓以君臣之道,告之以利害关系,证明辽朝大军压境确无占领国土之意。

(2) 第二次交涉

如辽圣宗诏书所言,辽军擒获康兆后,一路进军,高丽西北城砦皆为辽军所下。^⑨随后辽使刘经携檄文至西京谕降,为城中主战派智蔡文等暗中击杀。随后高丽显宗以“州郡陷没,上表请朝”^⑩,圣宗遂“以政事舍人马保佑为开京留守,安州团

练使王八为副留守。遣太子太师乙凛将骑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⑪,即是为高丽首次“请朝”。但西京守将智蔡文等人见韩杞询问刘经谕降一事,恐暗杀事发,于是击杀韩杞等人,又击退乙凛、马保佑。“请朝”遂成“诈降”。

从这一次交涉可以看出辽圣宗对于以高丽“请朝”作为退兵条件是满意的。此时不仅开京未遭兵戈,甚至西京也在固守顽抗,辽圣宗派出官员远赴开京的举动完全建立在相信高丽显宗“亲朝”的承诺基础上。^⑫辽军挟大胜之势却并未拒绝退兵的请求,显然未将攻城略地作为主要目的,更多的是将兵威视作要求高丽履行臣下义务的手段。

(3) 第三次交涉

高丽诈降令辽圣宗震怒,于是绕开西京,派兵直奔开京。显宗王询听从姜邯赞“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众寡不敌,当避其锋,徐图兴复耳”^⑬的建议,率众南行。观姜邯赞之言,显然高丽君臣中不乏对辽朝出兵有清醒认识之人,然而依旧不敢直面辽圣宗而南逃,除对诈降一事心怀忐忑外,亦难免有王询恐辽圣宗另择他人而立的担忧。^⑭“直入开京”本是辽圣宗于兴化镇谕降时做出的警告之言,如今显宗王询避而不见更令圣宗坚定了决心,于是萧排押兵入开京,“焚烧大庙宫阙”^⑮,“大掠而还”^⑯。

当此危急之际,河拱辰上奏“契丹本以讨贼为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请和,彼必班师。”^⑰显宗遂令其赴辽军请和。“拱辰行至昌化县,以表状授郎将张旻、别将丁悦先往契丹军。……旻等未至,契丹先锋已至昌化,拱辰等俱陈前意。契丹问王安在?答曰‘今向江南,不知所在。’又问远近。答曰‘江南太远,不知几万里。’追兵乃还。”^⑱时至今日,有关“江南太远”这一说辞,学界大多抱相信的态度,认为河拱辰利用辽圣宗对高丽具体情况的无知,轻易骗其退兵。然细检史料,发现统和二十年(1002),高丽就曾“贡本国地里图”^⑲,说明辽圣宗在出兵前便已获取了解朝鲜半岛地理环境的渠道。实际上辽军南下过程中遭遇的抵抗从未中断,且战线愈拉长,后勤补给愈吃紧。若坚持南下,则恐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

故辽圣宗借口“江南太远”，退兵还朝。

检讨三次关于“退兵”的交涉，辽圣宗始终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整理辽丽关系，无论是讨伐逆臣还是要求国王亲朝，都没有超出宗主国的权利范围。辽军深入高丽腹地，亦并非是对高丽抱有领土要求，主要还应归因于高丽对辽朝宗主国身份的不断挑战。

2. 交兵并举、重塑宗藩

(1) “亲朝”的交涉

辽朝班师后，高丽多次遣使，或谢班师，或贺冬至、生辰，虽有示好之态，却丝毫不言“亲朝”。又兼前番征讨辽朝损失巨大，辽圣宗不满更甚。圣宗开泰元年(1012)，高丽遣蔡忠顺“乞称臣如旧”^{②0}，仍不提“亲朝”，辽圣宗于是下诏明令高丽显宗亲朝。显然此时“亲朝”已经成为辽丽双方继续宗藩关系的条件。

高丽随后“告王病，不能亲朝”，辽圣宗遂下诏“取兴化、通州、龙州、铁州、郭州、龟州等六城”^{②1}。六城是高丽于统和十一年(993)在辽圣宗所赐鸭绿江女真地上所建，赐地的条件是高丽必须向辽朝称臣纳贡，同时断绝与宋朝的联系。高丽日后并未履行承诺，不仅私下遣使如宋，后还“至者无时”^{②2}。前次辽圣宗大举征伐高丽，究其根本便在于此。

讨回六城可以看做是辽圣宗对高丽的提醒与警告，其意在使高丽认识到辽丽间的君臣关系及对应的权利、义务。申明“亲朝”乃双方宗藩存续的条件，宗藩关系破裂，则高丽必须交还辽朝赠与的六城之地。

(2) 关于“六城”的交涉

高丽接到收回“六城”的要求后，数次遣使与辽朝进行交涉，试图使辽朝接受高丽言而无信的现实。辽圣宗亦“遣中丞耶律资忠使高丽，取六州旧地”^{②3}。伴随着使者的交涉，辽朝开启了新一轮军事征伐。开泰二年(1013)十月，详稳张马留献通晓高丽事的女真人，向圣宗介绍了高丽开京附近的详情，并为辽军规划了前进路线。次年，辽朝又“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②4}，为出兵高丽做了充分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虽然剑拔弩张，但聘使往

来并未断绝。《高丽史》记载高丽显宗四年(1013)五月，“契丹来告改统和为开泰”；六月，高丽“遣借尚书右丞金作宾如契丹贺改元”。^{②5}可见虽然纷争有愈演愈烈之相，但双方此时均未放弃宗藩关系。那么可以认为辽圣宗对高丽战与和的抉择，其意仍在于宗藩关系内部对辽丽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进行调整。

(3) 破而后立的宗藩关系

自开泰三年(1014)至开泰八年(1019)，辽朝对高丽发动的四次征伐均未有收效。这次大规模的征伐“历时六年，数易将帅，仍以契丹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②6}。外交上的情形同样不容乐观，索要“六城”屡次被拒，开泰四年(1015)，高丽甚至拘留了使者耶律资忠，其强硬态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为抵御来自辽朝外交、军事方面的压力，高丽寄希望于宋室方面的助力。开泰四年(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高丽致表北宋“请求赐历日及尊号，且言契丹于其国西鸭绿江头创浮桥，又于江东筑寨。”^{②7}但宋自澶渊之盟以来已无意与辽开战，故仅遣诏书以示安抚。面对辽方的巨大压力，高丽宣布“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②8}，以示与辽决裂。此举更加激起辽圣宗的怒火，是以遣使愈频，屡败屡战。

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对国力的巨大考验。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但作为主战场的高丽损失极为惨重，大有虽胜尤败之态。开泰七年(1018)，高丽遣“元永如契丹请和”，希望结束战争状态，却同时又“行宋天禧年号”，显然没有恢复宗藩关系的意愿。^{②9}辽圣宗自然不能容忍高丽既不归还“六城”，复又重行宋朝年号的悖逆之举，于是再发大军，又一次尝试以兵威重整宗藩关系。是役辽军大败，高丽也再无力支撑战局。开泰八年(1019)辽朝先遣使入高丽，随后高丽遣李仁泽如辽“乞贡方物”^{③0}，意味着一直态度强硬的高丽放弃了与辽朝的对抗。

高丽遣使令陷入战争困境的辽朝决定不再继续征伐，开泰八年八月“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讨高丽”^{③1}之举终未有下文。随后，高丽归还了扣留六年之久的耶律资忠，并奉表称藩纳贡。辽遂释王询之罪，同意其称臣纳贡的请求。

此后双方宗藩关系逐渐修复,但由于辽朝军事上未占上风,其所要求的“亲朝”“六城”问题遂不了了之。

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的调整给两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他背负上穷兵黩武的名声。如此巨大的代价却并未令高丽显宗亲朝,也未能收回江东六城,十年兵燹及外交博弈仅令双方回到刚刚缔结宗藩关系的状态。但经过十年纷争,高丽君臣深刻认识到辽圣宗规范宗藩关系的决心,此后终圣宗一朝始终保持了双方较为频繁的往来。双方重修旧好后,辽朝对高丽的政策强化了文化因素,其目的主要在于“德化”高丽。^②随着辽圣宗转而实行较为和缓的对高丽政策,辽丽双方得以保持稳定的宗藩关系直至辽圣宗去世。

政策调整原因探究

“辽自神册而降,席富强之势,内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时将帅震扬威灵,风行电扫,讨西夏,征党项,破阻卜,平敌烈。诸部震慑,闻鞞鼓而胆落股弁,斯可谓雄武之国矣。其战胜攻取,必有奇谋秘计神变莫测者,将前史所载,未足发邪?抑天之所授,众莫与争而能然邪?”^③元朝史官在修撰《辽史》时尝发此疑问。吴凤霞先生对此有深入的解读,认为元朝史官在未能找到辽朝战胜攻取原因的情况下,甚至将“众莫与争”归之于“天之所授”,同他们信奉“仁者无敌”,主张“兵者凶器也,可戢而不可玩;争者末节也,可遏而不可召”有很大关系。^④元朝史官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指出拥有强大军力的辽朝之所以“长世”,根源在于不轻易用兵。^⑤

诚如史家所言,“耀德”胜于“观兵”。为何辽圣宗在澶渊之盟之后,确切地说是在萧太后去世后旋即改变对高丽政策,不顾萧敌烈“国家连年征讨,士卒玩愒。况陛下在谅阴,年谷不登,创痍未复。岛夷小国,城垒完固,胜不为武,万一失利,恐貽后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问其故。彼若伏罪则已;不然,俟服除岁丰,举兵未晚”^⑥的谏言,执意发兵,不外两种原因,于内要树立个人威权,于外则要高丽认同辽朝的正统地位。

1. 内立威权

(1) 强化皇权

辽圣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其母承天太后“临朝称制凡二十七年”^⑦。承天太后在景宗时期(969~983)便已经开始参与政事,政治经验丰富。圣宗年幼时,“国事取决于其母”^⑧。至其成年,遇事仍然“拱手”母旁,聆听母训“略无怨辞”^⑨。学界基本上可以对承天太后在圣宗时期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达成一致,认为其“执政前期,正是圣宗年幼之际,她当然要站在第一线,随着圣宗的成长,萧太后的作用要有所减少。但是根据情况,完全可以断定,她仍不失为当政者,这一时期的政绩和存在的问题,当然不能完全归于萧太后,但首先应写在她的名下”^⑩,承天太后是“辽朝复兴的主要决策者”^⑪,圣宗成年以后,朝政亦多决于太后。

承天太后摄政的四十余年政绩斐然,圣宗长于其侧,“益习国事,锐意于治”^⑫,自然不甘心做一个守成之君。太后去世后,即位二十八年,年过不惑却刚刚脱离太后视线的辽圣宗急切地想要提升权威,加强皇权。但承天太后虽然辞世,余威仍在,后族依然有着与皇族分庭抗礼的实力。辽圣宗欲在此时加强皇权必须创下足以服人的文治武功,才能在太后长久的政治影响中有所突破,进而对后族进行有效遏制。前文所述萧敌烈之谏言不可谓不客观务实,虽然《辽史》中将圣宗的不予采纳归因于命令已下,但其中亦难免有对其国舅详稳身份的疑忌。再观察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征高丽的阵容,主要将领中皇族耶律氏占大半,除去少数几名汉臣与渤海臣,后族中仅萧排押一人而已,这与统和十年(992)征伐高丽时一任大事放心交于萧恒德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圣宗倚重皇族、削弱后族的意图已经初现端倪。

(2) 效法英主

圣宗“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服”,并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⑬。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时,亦令臣下“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⑭。鉴于《契丹国志》内容多来自《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书皆为宋人

所著,故圣宗赞宋太祖、太宗之语未必可信,然对照《辽史》可知圣宗对唐太宗、唐玄宗的钦佩乃是实情。

唐太宗、唐玄宗皆是对外强势的君主,对朝鲜半岛政权亦然。圣宗常以太宗、玄宗行事为参考,且当时承天太后仍在,政令多出于太后之手,那么将“‘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的错误决定”^⑤,完全归因于辽圣宗显然不妥。考察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的几番调整,可以看出其对高丽诸般表现不满已久,甚至深以“鸭绿江东数百里地”割让一事为憾。当日将土地赐予高丽实为利诱,目的在于建立辽丽间的宗藩关系,断绝宋朝东部的羽翼。事与愿违,高丽得此地后立即驱逐女真人,兴建城池,在辽丽接壤之处更是着重防御。更有甚者,高丽违背遣使如宋的承诺,日后又“贡献不时至”^⑥,与辽朝逐渐疏远。如此一来,辽朝赐地可谓得不偿失。圣宗多次兴兵征伐,又屡屡遣使讨回“六城”,初时不过是以“六城”相挟以使高丽显宗亲朝,后来不提“亲朝”,只索“六城”,似可以证明当日赐地一事辽圣宗其实并不认同。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立即着手整理辽丽关系,或许就是对昔日自己并不认可的政策进行修正。

2. 外正中华

辽自太祖开国,便已为日后辽朝发展奠定了“辽家遵汉制,孔教祖宣尼”^⑦的基调。欧洲著名学者沙畹认为在辽太宗时,辽朝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⑧,此说或许尚存争议,但历经百年的发展,至圣宗时,辽朝疆域辽阔,势力强劲,儒化程度更深,已呈一片蔚然华风乃是不争的事实。辽太祖、太宗时期,皆以“中国”自居,待辽宋签订“澶渊之盟”,辽朝的“中国观”开始变化,产生了“中国正统”的思想。^⑨在儒家文化的作用下,辽朝统治者意识到若天子至尊地位得不到外部承认,则其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遭到挑战。^⑩于是在辽朝内部对“中国”的身份已经确认无疑的情况下,其对于外部认同的需求便愈加迫切。这就解释为何辽朝帝王所努力追求的除了现实意义上的“广土众民”之外,一直未曾放弃争取“中国”身份的外部认同。

清人赵翼曾言“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以时势。”^⑪受澶渊之盟所限不能继续筹谋南伐的现实,同不断壮大的国力、日益深入的“中国”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统”观不断碰撞,在东亚范围内取得超越宋朝的地位并获得道统上的认同就变得十分迫切。高丽是东北亚地区少有的以儒治国的“礼仪之邦”,向来礼敬中原、恭奉正朔,若能令高丽承认辽朝为“中国正统”,则对于辽朝所追求的“中国认同”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辽圣宗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好读《贞观政要》等书,可谓深谙汉唐盛世治边之法,为何不效法前贤“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之“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⑫而强行征伐?非不明义理,实乃时势使然。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⑬,其所依靠的是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影响力、制度安排的影响力等在内的软实力。^⑭而对于辽王朝来说,此时依靠“软实力”怀柔受儒家文化熏染日久的高丽,无异于缘木求鱼。是故欲达成祖辈构建“中央之国”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以辽朝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唯有通过征伐使“强朝弱附”。

结 语

辽圣宗对高丽的连番征伐以及屡屡遣使所进行的交涉,归根究底是希望得到高丽的认同,希望高丽对辽的臣服不是“畏威”而是“归心”。但持续十年之久的交锋,给两个国家及双方的百姓造成了巨大负担。在这场国力的比拼中,高丽率先妥协,也为辽朝结束战争提供了理由。双方重新建立宗藩关系之后,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没有就“亲朝”“六城”等问题再做过多交涉,这对高丽来讲自然求之不得,对辽圣宗来说却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无论如何,双方宗藩关系经此十年之役逐渐步入成熟。^⑮此后辽朝再未兴大兵讨伐高丽,盖因“时势”已经通过武力得以变化,遵循“义理”多修文德已经上升为主要任务。

- ①参见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杨军、王秋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 ②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 ③⑤⑦⑩⑫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84、184、184、184、187、189、191页。
- ④⑥⑬⑮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世家一》，（香港）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上册，第88、88、88、91~92、92、97、99页。
- ⑧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四《杨规传》，（香港）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下册，第103页。
- ⑨韩国学者曾有“既已诛杀康兆达成目的，理应撤军，却直向南攻，则其兴师的侵略行为已昭然若揭”之论断，不知是否有考虑到谕降书中所透露的信息。参见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 ⑩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四《智蔡文传》，（香港）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下册，第104页。
- ⑫王民信先生认为此处开京应为西京之误，并且在王询未请降时，西京已经为辽军攻下[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16页]。但《辽史》《高丽史》均明确记载，在辽朝接受请降并派出马保佑等人后，才发生高丽西京守将杀害辽朝使者之事。且《高丽史·智蔡文传》中对之后辽丽双方围绕西京展开的交锋还有诸多记载，直至智蔡文逃奔开京，统军录事赵元依旧率众闭门固守，王民信先生此说似不成立。有韩国学者指出辽圣宗派出开京留守及副留守是在占领区建立了行政体制的一种表现（卢启炫《高丽外交史》，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此说同样值得商榷。无论此处所言确是开京，还是如王民信先生认为之西京，此时均未被辽军占领，则“占领区”一说便不攻自破了。
- ⑬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四《姜邯赞传》，（香港）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下册，第100页。
- ⑭王询母景宗妃皇甫氏，乃太祖王建孙女、戴宗之女。景宗去世后，皇甫氏与太祖子安宗王郁私通而生王询。虽然高丽王室从头到尾都维持族内婚制，并通过族内婚制维持嫡庶之身分制度，以确保王权（朴延华、李英子《高丽王室族内婚制及其变化》，《东疆学刊》2003年第1期），但王询私生子的身份仍然尴尬。穆宗无子，当时太祖后人可继承王位者仅有王询一人，故王询得以为穆宗及大臣所选择。康兆用事后，流落民间的孝隐太子之子王琳、王禛得以恢复宗籍。二人的出现，改变了王询作为高丽王室硕果仅存的局面，王询避辽军唯恐不及，恐怕更多的是担心辽圣宗另择他人而令自己无立足之地。
- ⑮《辽史》卷八八《萧排押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76页。
- ⑯⑰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四《河拱辰传》，（香港）亚细亚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下册，第109、109页。
- ⑱《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72页。
- ⑳《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672页。
- ㉑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 ㉒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1995年标点本，第1957页。
- ㉓㉔《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209、208页。
- ㉕姜维东《辽使儒化现象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
- ㉖《辽史》卷九五《耶律弘古、耶律马六等传》，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532页。
- ㉗吴凤霞《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
- ㉘《辽史》卷三六《兵卫制下》，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4889页。
- ㉙《辽史》卷八八《萧敌烈传》，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473页。
- ㉚㉛㉜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七《圣宗天辅皇帝》，中华书局2014年标点本，第71、80、80页。
- 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春正月戊寅”条，中华书局1995年标点本，第602页。
- ㉞孟广耀《肖太后考评——兼论〈澶渊之盟〉》，《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 ㉟苗泼、曹显征《论辽代的母后摄政》，《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 ㊱《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041页。
- ㊲《辽史》卷八〇《马得臣传》，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409页。
- ㊳郑川水《辽圣宗及辽与高丽藩交考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 ㊴《辽史》卷八八《耶律资忠传》，中华书局2016年点校本，第1478页。
- ㊵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一二《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260页。
- ㊶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参见王承礼等《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 ㊷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页。
- ㊸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6页。
- ㊹赵翼《廿二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89页。
- ㊺《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3834页。
- ㊻《论语·季氏》，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注解本，第250页。
- ㊼方铁《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
- ㊽杨军、王秋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作者简介：陶莎，1983年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潘清）